

# 言與不言之間：龍瑛宗〈蓮霧的 庭院〉中「灣生」的意義

木山元彰

國立政治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博士生

## 中文摘要

台灣作家龍瑛宗（1911-1999）於 1943 年發表的小說〈蓮霧的庭院〉（蓮霧の庭）描述的是台灣人（我）與鄰居的在台日人藤崎一家人（父、母、一子二女為灣生）時而和睦相處、時而在內心糾結的景象。當前研究咸從民族融合或應時文學的角度切入，從中探測殖民主義壓迫身心的力度。然而，是否可以將灣生直接等同於台、內之辨中的內地一方，此研究前提值得進一步細緻區分。本文挪用符號學式的分析架構，探討作品中出現諸多對藤崎家及其個別認同進行複雜指涉的符號，發現其確實有別於廣義在台日人，而有異質性。並且，灣生家庭的邊緣性質看似呼應了龍瑛宗身為客家人受到雙重壓迫的流動主體。由此推論，龍瑛宗居於嚴峻的戰時動員體制中，試圖於字裡行間迂迴創造協商空間的可能性。本文期望藉由探討殖民時期之文學作品〈蓮霧的庭院〉中灣生與在台日人的再現，在國族的想像上提出不同的閱讀觀點。

關鍵字：灣生、邊緣主體、蓮霧

# **Inexpressible Dissent: The Wansei in Ryu Ei-Sou's Novel “The Garden of Wax-apple”**

Kiyama Motoaki

Doctoral Student,

Graduate Institute of Taiwa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 **Abstract**

“The Garden of Wax-apple” is a 1943 novel written by Ryu Ei-Sou (1911-1999), who in the novel depicts not only the harmony but also the entanglements between a Taiwanese protagonist and a Naichi (Japanese) Fujisaki family. As it is a story about interaction between different ethnic groups in the wartime background, academic discussions often centered on ethnic harmony or the Japanese colonial policies in Taiwan. However, the premise that the Wansei are included in the Naichi side deserves further careful attention. Since many symbols are presented in the novel, this article employs the analysis framework of semiotic and discusses the complex references to the Fujisaki family and their individual identities in the text. The article finds that the Wansei are different from the generalized Naichi people in Taiwan. Also, it seems that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Ryu (Hakka/Min/Japan) and the Wansei (Naichi/Taiwan/Nanpō) are somewhat similar, since they both share the double, or fluid, consciousness of their identity. It can be inferred that Ryu, living in a strict wartime, tried to create

the possibility of negotiating space by detours between the lines. By exploring the literary representations of the Wansei (or the Japanese in Taiwan) in the text, we would like to bring different points of view on the imagination of the nation.

**Key words:** Wansei, marginal subjects, wax-apple

# 言與不言之間：龍瑛宗〈蓮霧的庭院〉中「灣生」的意義\*

## 一、前言

1937年盧溝橋事變、1941年太平洋戰爭接連爆發，在戰況日益吃緊的狀況下，台灣文壇開始受到「決戰體制」的影響。例如，1943年以總督府為首成立了「日本文學報國會臺灣總部」與「臺灣文學奉公會」後，台灣作家受到日本作家的指揮，並且被排除在決策圈外，皇民化文學的色彩日趨濃厚<sup>1</sup>。戰後重新看待此時期台灣作家的作品時，往往以意識型態為量尺，評價其究竟是抵抗日本或是順應日本，乃至是否呼應東亞論述等。即便有論著避免此般民族主義式的論斷，仍然難以擺脫日本／台灣、和／漢民族等均質的二元對立預設。

隨著日本殖民統治（1895-1945）超過四十年，在台日人及其第二代「灣生」的數量也日益增長<sup>2</sup>。不論是由灣生書寫的文學，或是描寫灣生的文學，有關帝國邊緣主體的作品也在這個時期陸續問世。龍瑛宗（本名劉榮宗，1911-1999）於

\* 感謝三位匿名審查委員的悉心審閱，提點筆者彌補諸多不足之處，在此謹致謝忱。另，本文初稿原題〈邊際人與文學中的灣生：再探龍瑛宗〈蓮霧的庭院〉〉，宣讀於文圖學會主辦的「台灣與東亞的文本·圖像·視聽文化國際學術論壇」（2021年6月26日，線上舉行），承蒙該場次評論人陳國偉老師惠賜本文寶貴意見。

<sup>1</sup> 陳芳明，《台灣新文學史》（新北：聯經，2011年），頁184。

<sup>2</sup> 以總督府的統計資料為例，1930年居於台灣「島內出生」的「內地人」為75,457人，占該年居住台灣的內地人總數33.0%。從出生人口來看，1936年「內地人」有7,918人，約占該年整體出生人口3.4%，到了1942年則為10,900人，約為整體4.3%。灣生人口粗估有成長趨勢。臺灣總督府，〈本籍及出生地別內地人比較〉，《國勢調查結果表全島編》（臺北：臺灣總督府，1934年），頁452-455；臺灣總督官方調查課，〈身分別出生〉，《臺灣人口動態統計》（臺北：臺灣總督官方調查課，1938年），頁66-67；臺灣總督府總務局，〈身分別出生數〉，《臺灣人口動態統計》（臺北：臺灣總督府總務局，1942年），頁36-37。

1943年發表的小說〈蓮霧的庭院〉(蓮霧の庭，下稱：〈蓮霧〉)描述的是台灣人「我」與鄰居的藤崎一家人(父、母、一子二女，孩子為灣生)時而和睦相處、時而內心糾結的景象<sup>3</sup>。這篇小說有幾個特色，首先它是由台灣作家描述的灣生／在台日人，較為罕見；其中灣生主角的刻劃與同時期其他類似題材作品不同，有著樂觀、相對無感的性質。接著，該家庭成員間的身分認同並不完全一致，例如母親的態度就相對接近在台日人的日本本位形象。除了朝思暮想內地景緻，對台灣則幾乎沒有好評，在地認同與丈夫、兒子的意見不一致。龍瑛宗描述父與子的時候，讓他們有了與同時期作品殊異的灣生特質，但與此同時他也安排了母親的角色，較為貼近日本統治階級的刻板形象，某程度藤崎家的成員演示了「積極的灣生」與「消極的在台日人」二條軸線。

在「我」與上述二條軸線交錯的藤崎家往來之際，有矛盾、重合、糾結的思緒在其中。例如蓮霧／黝黑的皮膚、蘋果紅的臉頰／高山等符號看似是互斥的矛盾；兒子跟「我」說只要有愛沒有什麼不能跨越的，但是母親卻因族群問題否定「我」與大女兒論及婚嫁的可能，形成糾結的情緒；藤崎父子照顧生病的「我」卻又是真心誠意，顯示融和的景象。在皇民化運動如火如荼展開之際，上述混雜而曖昧的一家，亦即書寫灣生／在台日人的意義，看似仍有討論的餘地。以往的研究儘管對該家族的異質性有所介紹，但幾乎不約而同地將藤崎一家化約為「內地人」家族，在這前提下去談「民族」融合、隔閡、感情等問題。將〈蓮霧〉重點放在「民族融合」乃至「皇民化運動」的議題上，往往不脫「真」民族融合／「假」民族融合、皇民／反皇民框架加以探討<sup>4</sup>。

對此，本文將進一步注視藤崎家的異質性，觀察其內含的混合性質(hybridity)是否能真對應到日本當局的意識型態。借用協商解讀(negotiated reading)的觀點，探討「灣生」(兼在台日人)作為龍瑛宗極其迂迴地表達不同意見的機制之

<sup>3</sup> 作品最初刊登於《臺灣文學》3卷3號(1943年7月)，頁189-203。本文依據的版本是下村作次郎編，《日本統治期台灣文學台灣人作家作品集(第3卷)》(東京：綠蔭書房，1999年)，頁323-337。

<sup>4</sup> 另一方面，朱惠足提及藤崎少年從日本、台灣再到南洋的移動，象徵了「灣生」作為「不純正」的日本人，呈現日本帝國主義主體建構的兩個方向相反但互補的社會心理學軌跡：隨著帝國版圖擴大出現的離心力與尋求被認為「本真」(authenticity)日本人的向心力。參照朱惠足，〈左翼人道主義、南方想像與幻像顯影〉，《帝國下的權力與親密》(台北：麥田，2017年)，頁150。

可能<sup>5</sup>。亦即，將藤崎家從一般「內地（日本）人」的範疇中分離出來，使之自成一個類別的前提下，觀察非均質的藤崎家與「我」之間的互動關係。如此便能跳脫以往非此即彼的抗日／妥協；民族融合／批判；內地本位／台灣本位等討論模式。筆者認為新的閱讀方式，一方面能對於以往研究中龍瑛宗的被動形象，提出不同角度的切入點：即在言與不言之間，如何最大化地運用內地符號，吐露己見的策略；一方面藉由突顯灣生作為戰時殖民地作家表達不同意見的突破口，重新認識所謂內地（日本）人並非鐵板一塊的現實。

有關龍瑛宗的作品特徵，其三〇年代的小說風格與其他寫實主義文本的積極氣勢有所不同，而在四〇年代則避免觸及「皇民化」的寫作題材<sup>6</sup>。葉石濤指出，龍瑛宗的作品透過知識分子的灰色生活，連帶地刻劃日本黑暗的殖民統治和台灣民眾的困苦生活<sup>7</sup>。台灣文壇開始受到「決戰體制」的影響，言論日益緊縮，本島作家即便有著別於內地人的認同，但是寫作不得不迎合官方的意識型態，以鼓吹宣揚「皇民」煉成為第一要務<sup>8</sup>。舉例而言，陳火泉（1908-1999）〈道〉（1943）的主角近乎發狂的靈魂裂解狀態；以及王昶雄（1915-2000）〈奔流〉（1943）三個主要人物各自面對「皇民化運動」的對應與其「格格不入」的樣貌，縱使題材對應時局，卻顯示了面對日本虛偽的同化政策下，台灣作家迫使己身「從不同到同一，進行心的改造」時精神的苦楚<sup>9</sup>。

<sup>5</sup> 在此借用傳播學者 Stuart Hall（1980）的接收分析理論觀點。他從電視分析創建理論，認為產製者在製作訊息時通常會嵌入優勢或支配式解讀（preferred, dominant reading），但反過來閱聽人也可能發展出直接反駁支配式解讀的詮釋，形成對立式解碼（oppositional decoding）。但是除了這兩者之外，也可能創造出不同意訊息中一部分，與支配式解讀在某些重大意義上相左的協商式意義（negotiated meaning）。參照彭懷恩，《大眾傳播理論與模式》（新北：風雲論壇，2016年），頁258。

<sup>6</sup> 羅成純，〈龍瑛宗研究〉，收錄於龍瑛宗著，張恆豪編，《龍瑛宗集》（台北：前衛，1994年），頁240、306。

<sup>7</sup> 葉石濤，〈台灣新文學運動的展開〉，《台灣文學史綱》（高雄：春暉，2010年），頁109-110。

<sup>8</sup> 陳建忠，〈未癒的殖民創傷 再論台灣文學史上的「皇民文學」議題〉，《日據時期台灣作家論：現代性本土性殖民性》（台北：五南，2004年），頁274-275；林瑞明，〈騷動的靈魂——決戰時期台灣作家與皇民文學〉，《台灣文學的歷史考察》（台北：允晨文化，1996年），頁318-324。所謂「皇民文學」大抵可歸為以下三類：（一）描繪成為皇民、日本國民的心路歷程；（二）描繪志願從軍或預祝勝利；（三）描繪增產、南進、團結等積極意識的作品。戰後受到批評居多。例如林瑞明以當時獲獎的兩作品王昶雄的〈奔流〉與陳火泉的〈道〉為例，指出兩者內在抗議成分的差異而對〈道〉有較多批評。

<sup>9</sup> 劉紀蕙，〈從「不同」到「同一」：台灣皇民主體之「心」的改造〉，《台灣文學學報》第5期（2004年6月），頁51。

然而〈蓮霧〉沒有像〈奔流〉、〈道〉討論如何成為皇民或是唯有犧牲生命才有機會成為皇民的問題。龍瑛宗討論的反而以民族差異為前提下的和諧（我與藤崎父子）、和諧中的違和（我與藤崎母女）、以及同一家族裡面不同認同的角力（父、子與母），在這之中又包含了鄉愁（內地／台灣）與旅外（台灣／南方）的拉扯。即便民族融合、南洋從軍等題材，或是「我」對南行充滿遐想又羨慕的描述，某程度符合時代要求，但以「失去故鄉」的灣生本身作為主角，母親朝思暮想回內地、以及「我」沒有對報效皇國的行為多做表態，其傾向又跟同一時期的所謂「皇民文學」的方向大異其趣。

龍瑛宗曾表示：「〈蓮霧〉是以民族間的和睦為主題」<sup>10</sup>，可能是因為如此，往後的研究不論同意此觀點與否，大致是從民族和睦的角度出發，各抒己見。許維育側重在入境隨俗的藤崎父與尊重日本文化的主角間相互對等的地位與人情味的互動，認為其內台和睦的現象反映的是在皇民化運動下，具有「客家情結」的龍瑛宗將之轉化為一種普遍而全面，隱然包含閩南與客家之間民族融合理想的作品<sup>11</sup>。羅成純指出〈蓮霧〉的融合景象中，「我」清楚意識到自己與日本人不是不同人種的前提下，被動接受他們的善意<sup>12</sup>。王莉雅則從傅柯（Michel Foucault）提出的「異質空間」（heterotopia）進行分析，指出〈蓮霧〉中主角與藤崎一家的「內台」融合之溫馨景象乃是在跨越民族藩籬的幻想，在虛擬地點呈現主流社會所闕漏的價值觀，並從中揭露殖民地深藏的矛盾<sup>13</sup>。朱玉芳載於《聯合文學》的導讀中指出，即便藤崎父子有著「台灣本位」的特殊性，但是文中父親希望兒子能回一趟內地「看看」之處，看似仍具有追隨日本本源的性質<sup>14</sup>。

陳芳明則使用「策略」一詞來形容龍瑛宗四〇年代的作品傾向：

<sup>10</sup> 龍瑛宗，〈憶起蒼茫往事——「午前的懸崖」二三事〉，《文訊》第30期（1987年6月），頁59。

<sup>11</sup> 許維育，〈理想的建構——談龍瑛宗〈蓮霧的庭院〉與呂赫若〈玉蘭花〉〉，《水筆仔》創刊號（1996年12月），頁2-13。

<sup>12</sup> 羅成純，〈龍瑛宗研究〉，收錄於龍瑛宗著，張恆豪編，《龍瑛宗集》（台北：前衛，1994年），頁305-306。

<sup>13</sup> 王莉雅，〈〈植有木瓜樹的小鎮〉〈蓮霧的庭院〉的「越界」書寫〉，《中正臺灣文學與文化研究集刊》第17輯（2016年6月），頁76-78。

<sup>14</sup> 朱玉芳，〈超越時代的民族情感〉，《聯合文學》第182期（1999年12月），頁109-113。

這些小說卻是創造於戰爭年代的皇民化運動浪潮中，他的小說經營顯然也富有政治意義的策略……他沒有配合皇民化運動，沒有呼應國策，但是他也沒有批判殖民體制，也沒有表露反戰姿態。那種自然主義式的悲觀情緒，無需詮釋，便足以道盡一切。<sup>15</sup>

然而，龍瑛宗不一定完全「沒有批判殖民體制，也沒有表露反戰姿態」。例如王惠珍探討 1942 年被迫參加戰爭期宣揚「大東亞共榮圈」政治「戲碼」前後的活動狀況，分析龍瑛宗即便有參與，但極少談論文學以外的事物，對當局政策事實上是消極的<sup>16</sup>。文中進一步指出，其中「內台融合」的描寫是表面上沿著東亞共榮的題目，實則因主角對追求內地女子產生無力感顯得民族藩籬猶存，導致「文本中越是提升內台融合的理想高度，反而越加凸顯殖民現況族群隔閡的問題」<sup>17</sup>。筆者認為，若能將過去研究中指稱的「內地人」，事實上並不那麼純粹的「內地」性質再予以剖析，〈蓮霧〉時在彼端、時在此端的矛盾、纏繞，應時中的不應時等，可望更加清晰。

時代要求下，民族融合與肯定南方的主題在所難免。然而，上述研究在分析的階段，多半已經將藤崎家自動歸位在日本一方，可以說缺乏從灣生角色的意義進行探討的視野。筆者並非否定藤崎家的日本性質，而是觀察日本性質的角度尚有開發的空間。先行研究傾向從藤崎家與台灣人「我」相比較，自然就會突顯身為日人宰制／被宰制的色彩。然若換個角度，將藤崎家與居於內地的日本人或居於台灣的官吏階級日本人相比較時，反而可以看到其不純正、邊緣、弱勢的一面，並與龍瑛宗的個人性格以及甚囂塵上的東亞論述有所呼應。和泉司指出兒子的生活習慣在地化以及不熟悉內地的態度，並不表示對未來內台平等的樂觀，反而是限於統治／被統治的不平等框架下所產生的難得現象<sup>18</sup>。筆者同意此統治／被統治的框架勢必存在，但是灣生、以及位居邊緣的在台日人還

<sup>15</sup> 陳芳明，《台灣新文學史》（新北：聯經，2011年），頁176-178。

<sup>16</sup> 王惠珍，〈第一回大東亞文學者大會的虛與實：以龍瑛宗的文藝活動為例〉，《台灣學誌》創刊號（2010年4月），頁40、43、46。

<sup>17</sup> 同註16，頁52。

<sup>18</sup> 和泉司，〈錯綜する『内』と『外』——四〇年代台湾文壇における「蓮霧の庭」と龍瑛宗を中心に〉，《三田國文》第44號（2006年12月），頁17。

存有多少統治階級的優勢；是否能與一般「內地人」的力度等量齊觀，值得進一步思考。

## 二、邊緣、流動主體的重合

### (一) 灣生及在台日人：日本性消褪的危機

顧名思義，灣生狹義而言是日本統治時期用來指稱在台灣出生長大的第二代、第三代日本人的詞彙，與單純從日本渡台的人有所區分<sup>19</sup>。現實生活中，灣生先天上以殖民統治階級的孩子之姿生在殖民地，與多數「本島人」相較之下，在血統上帶有優越地位。某些戰敗前從未到過內地的灣生，「生於斯長於斯」，也因自小熟稔當地而自然產生一定的土地認同。另一方面，灣生受到身體素質退化等汙名論述，從而容易受到內地人的歧視眼光<sup>20</sup>；對本地人而言則是易因鮮少與之混居而產生陌生之感。雖然實際情況各有不同，但可以想像其身分處於「日本的外地人／台灣的內地小孩」之雙重邊緣（或帶有中間性質的）位置上<sup>21</sup>。

灣生跟所謂一般「在台日人」的最大差別在於內地經驗、認同的親疏，尤其是成長期間長期在台頗為重要。〈蓮霧〉的家庭成員中，以兒子為首的三位小孩是灣生；而久居二十年，積極熟習台灣並且決心死在台灣父親，即便不是灣「生」，依照其接納的態度，或也無法輕易歸納為一般的在台日人。鳳氣至純平將非出生於台灣，惟幼少年成長經驗都在台灣，且成年後繼續在台發展的日本人也納入灣生的定義中，並指出其「故鄉喪失」的特質<sup>22</sup>。如 1940 年於《文藝臺灣》的灣生對談中曾提及：

<sup>19</sup> 津田勤子，《菁英、文藝與戰爭：由舊制台北高等學校傳聞雜誌《雲葉》與《杏》看菁英學生的精神樣貌》（台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出版社，2018 年），頁 40。

<sup>20</sup> 諸如「台灣ボケ」（台灣呆）等詞彙形容渡台日人身體與精神將會退化，爾後甚至出現「日本在台的第二代子女，在體質素質意志勞動力競爭力上，幾乎都不如本島人」等論述。參照巫毓苓、鄧惠文，〈熱、神經衰弱與在台日人——殖民晚期台灣的精神醫學論述〉，《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 54 期（2004 年 6 月），頁 69-70、75-76。

<sup>21</sup> 游珮芸，《日治時期台灣的兒童文化》（台北：玉山社，2007 年），頁 124。

<sup>22</sup> 鳳氣至純平，〈日治時期在台日人的台灣歷史像〉（台南：國立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14 年），頁 144、165。

我們是純粹意義上的第二世，當然也是故鄉喪失者……然而我們老爸老媽所認知的那個世界，對我們而言不過是童話故事而已，完全沒有故鄉的感覺……所以說，我們的故鄉分裂成兩種類別，也就是原籍地與現居的台灣。<sup>23</sup>

由此觀之，灣生對故鄉的認知，極有可能是分裂、想像、混淆、疏離、陌生的。例如黃氏寶桃（不詳）〈感情〉（1936）、庄司總一（1906-1961）《陳夫人》（1940、1942）等內台混血下的灣生，面臨內心認同進退維谷的焦慮感；其他內地人所描寫的灣生如川合三良（1907-1970）〈轉校〉（1941）、濱田隼雄（1909-1973）〈病牀日記〉（1940）等，也因為喪失故鄉的氛圍呈現性格憂鬱、迷惘的負面形象<sup>24</sup>。但是〈蓮霧〉中卻幾乎看不到這樣的現象。此外，也不同於在台日人統治階級的形象，藤崎家因為家道中落而住在本島人區簡陋的房子，兒子還被要求就讀商業學校，以期拯救家境。〈蓮霧〉灣生故鄉不是穩固的；社會地位也處邊緣，但一貫採取樂觀進取、不在乎族群問題的態度，缺乏上列作品的哀愁感。朱惠足從灣生兒子在南方從軍的敘事觀察，指出具有混雜性的灣生同樣是皇民化鍛造對象，這般內地、台灣、南方的移動歷程，一方面象徵日本帝國版圖的擴張，一方面是「非正統帝國主體」尋求認可的軌跡<sup>25</sup>。南進固然是順應四〇年代主流霸權論述的敘事，然而若將思考焦點放在台灣作家龍瑛宗書寫「非正統帝國主體」灣生的意義，或可開啟另外一條思路<sup>26</sup>。

<sup>23</sup> 萬波おしえ、遠藤太郎，〈文化放談 故郷と第二世の問題〉，《文藝臺灣》2卷1號（1940年3月），頁104。原文日文，筆者自譯。

<sup>24</sup> 林慧君，〈日據時期在台日人小說中灣生的認同歷程〉，《國文天地》25卷3期（2009年8月），頁56-61。

<sup>25</sup> 朱惠足，〈左翼人道主義、南方想像與幻像顯影〉，《帝國下的權力與親密》（台北：麥田，2017年），頁146-150。

<sup>26</sup> 有關灣生、「第二世」文學的研究或論述，早期有如新垣宏一於1941年發表的文章。他將在台日人二世（第二代）分為兩類，一是官吏之子；二是從小與本島孩童一起玩耍成長的「台灣之子」。並認為未來應該由「二世」來「接地氣」地創作富有台灣土地芳香的文學。由此可觀察到，「二世」或「灣生」在血緣上不同於本島人，是為「台灣的內地人」；而生長經歷又幾乎都在殖民地甚至從未到過本土，故又是「外地日本人」的身分，在日治晚期已經釀成一定程度兩者皆非、時而兩者兼具的特殊性質之論述。即便新垣不一定以負面情緒看待，但已經有意識地進行一些分類與區別，與〈蓮霧〉中的兒子的無意識也形成差別。參見新垣宏一，〈第二世の文學（上）〉，《臺灣日日新報》，1941年6月17日，第4版；新垣宏一，〈第二世の文學（下）〉，《臺灣日日新報》，1941年6月19日，第4版。

另一方面，「在台日人」的故鄉就是內地，或是將內地視為故鄉的比例較高，如果對台灣沒有產生後天的認同或情感，又因故必須久留，便可能出現精神上身在台灣、心在內地而朝思暮想的齟齬。例如〈蓮霧〉中的母親就比較接近內地人的刻板形象，除了時常讚頌、想像回不去的故鄉之外；談到結婚問題還因為「我」是本島人而有難色，對台灣沒有好評。和泉在其論文中以「在台日人的角度」一節細膩地刻劃了渡台一世的母親拒絕台灣／思念內地的心理是源自於對喪失故鄉的抗拒<sup>27</sup>。不論是決定永遠不／沒回去過內地的，還是想回內地的，藤崎家各個成員，似乎因為時空的限制導致其故鄉皆不甚穩固。甚且，從經濟狀況推估，其社會地位在內地人社群裡也是處於邊緣或孤立的。

## （二）被殖民與客家情結：雙重邊緣而流動的主體

1940年初，應西川滿（1908-1999）邀請，龍瑛宗擔任臺灣文藝家協會機關誌《文藝臺灣》的編輯委員。由於該雜誌以在台日人為主，加上總督府高官與在台日本文化人關係密切，以及島田謹二在其中提倡的「外地文學」色彩，故此刊物與被統治者的立場可說是背道而馳的<sup>28</sup>。原來在《文藝臺灣》的另一名作家張文環脫離後另立《臺灣文學》雜誌時，由於未與龍瑛宗商議接洽，故產生誤會。龍瑛宗在回憶中提及，起初他認為是由於自己身為少數族群的客家人，不會說河洛話又木訥，所以遭受這些「河洛人的集團」疏遠，一度決心除非對方示意不然不會主動加入該陣營<sup>29</sup>。直到爾後兩人參與「第一次大東亞文學者大會」之後，心結才終於解開，並移至《臺灣文學》雜誌。葉石濤將同樣是客家人的吳濁流、戴國輝相比較，指出由於出身階級、工作、內向個性、語言障礙，使得龍瑛宗不

<sup>27</sup> 和泉司，〈錯綜する『内』と『外』——四〇年代台湾文壇における「蓮霧の庭」と龍瑛宗を中心に〉，《三田國文》第44號（2006年12月），頁16。

<sup>28</sup> 羅成純，〈龍瑛宗研究〉，收錄於龍瑛宗著，張恆豪編，《龍瑛宗集》（台北：前衛，1994年），頁258-262。

<sup>29</sup> 龍瑛宗著，林至潔譯，〈《文藝臺灣》與《臺灣文藝》〉，收錄於龍瑛宗著，陳萬益編，《龍瑛宗全集〔中文卷〕第七冊 隨筆集（2）》（台南：國家台灣文學館籌備處，2006年），頁8-12。

如吳、戴等人身為客家「理直氣壯」，靈魂深處受到河洛人壓迫而顯得退縮與妥協，而擁有一名為「客家情結」的自卑心理狀態<sup>30</sup>。

有論著以「東方的猶太人」形容客家人，並刻劃從中原遷移至南方各地成為華僑，並且與當地居民爭地的歷史，強調其不與當地同化以及離散又團結的性質<sup>31</sup>。「客家情結」<sup>32</sup>在台灣的情況可以歸結於移民歷史中與閩南人的互動、比例的問題，以下文獻能讓我們揣想當事人的心境：

客家人總是處於惡劣的環境與原住民拼鬥，而福佬人則居於城中，負責與官府打交道。……只是在合作、競爭、衝突下，作為少數族群的客家人或者再度移民，或者則被涵化或同化。同化者忘了自己是客家人，然而涵化者卻是只能盡量掩飾自己客家人的身份。而對於有認知卻無法說出自己是客家人的人來說，這種情境便造就了一種受壓迫心態，主導個人的性格，在本文亦稱之為「客家情結」。<sup>33</sup>

龍瑛宗的情結來自幼年時期的生活經驗：一方面看到客家人所處的文化與經濟低落的狀態；一方面體認到族群區分下永遠的恐懼以及悲哀。意識到要同時保有經濟與提升文化的課題，長大後卻發現在主流社會中自身「無法語言」的困境，終究導致更加強化其「流動主體」<sup>34</sup>。陳芳明在〈南國崩壞〉中亦指出龍瑛宗受

<sup>30</sup> 葉石濤，〈論龍瑛宗的客家情結〉，收錄於龍瑛宗，《杜甫在長安》（台北：聯經，1987年），頁（一）～（六）。

<sup>31</sup> 高宗熹，《客家人：東方的猶太人》（台北：武陵出版，1992年），頁9-12。

<sup>32</sup> 張維安指出三〇年代客家研究剛起步曾出現客家人以「正統漢人」自居的論述，而台灣社會科學長時期以來在原住民與漢人的分析中，將客家人、閩南人和外省人放在一起作為「漢人」，在本省與外省的分類中，客家人和閩南人放在一起做為「本省人」，客家總是有被霸權收編、隱性化的趨勢。同樣在文學方面，邱雅芳認為從日治時期到戰後的各個年代中，都出現過重要的客家創作者，然而客家的聲音一直沒有被特別彰顯，1988年客家族群的「還我母語運動」開展以後，「客家文學」才被當作專有名詞重新討論。張維安，〈族群記憶與臺灣客家意識的形成〉，《思索臺灣客家研究》（台北：遠流，2015年），頁107、195-197；邱雅芳，〈客家作家在台灣文學史的位置：以葉石濤、彭瑞金與陳芳明的台灣文學史書寫為探討對象〉，《全球客家研究》第9期（2017年11月），頁252。

<sup>33</sup> 蔣淑貞，〈反抗與忍從：鍾理和與龍瑛宗的「客家情結」之比較〉，《客家研究》1卷2期（2006年12月），頁14。

<sup>34</sup> 同註33，頁28-30、36。

到兩大霸權壓抑的邊緣性，致使他多以女性角色來表達他極度自卑中進行抵抗，在那個時代只能以「邊緣人」定位自己<sup>35</sup>。

芝加哥社會學派帕克（Robert E. Park）於二〇年代開展的「邊際人理論」（marginal man theory）觀點，或可借鏡<sup>36</sup>。儘管該理論一開始是以歐美猶太人與混血兒為基礎，後來其弟子斯氏（Everett V. Stonequist）進一步發展了理論，將邊際人的可能族群細分為三類：混血兒、移民以及被殖民者。在此他提示了除種族混血以外，文化混血（後兩者）也有發生邊際狀態的可能性。亦即，當移民的第二代比雙親快速接受當地文化，而雙親的文化與當地文化呈現明顯差異，以及殖民地的人們感到無法同時效忠傳統舊有秩序與新的外來秩序時，個體便容易具有邊際人的性質<sup>37</sup>。從這個角度觀之，〈蓮霧〉作中的藤崎家，尤其孩子們，接近移民邊際人的定義；而就龍瑛宗本身的處境而言，則是殖民地邊際人的屬性。

儘管兩者依照上述定義皆屬邊際，其內涵仍然有差異：龍瑛宗的流動主體背後有「客家情結」以及日本統治下被「壓迫」的心理因素背景存在，面對國與族皆有不確定性。而作中人物的邊緣主體，心態上無論如何都是內於帝國而穩定，有樂天的空間，邊緣是相對於內地時而產生。筆者認為，〈蓮霧〉是龍瑛宗在言論統制的時代，試圖假灣生這般帝國的「邊緣主體」，既能涵括背反的時代需求：日本本位主義與大東亞論述下的多元性，又同時能在此框架中試圖帶入、投射自身雙重壓迫下「流動主體」的機制。亦即，灣生與在台日人即便邊緣，仍收斂在帝國範疇裡，使龍瑛宗在大東亞、皇民、八紘一字等官方論述鋪天蓋地的戰爭末期，有婉轉表達不同意見的可能<sup>38</sup>。

<sup>35</sup> 陳芳明，「陳芳明手稿〈南國崩壞〉」（1994年3月10日），國立政治大學圖書館藏，檔案典藏號：ccl\_fm\_ma\_00457。

<sup>36</sup> 「邊際人理論」（marginal man theory）首先由美國社會學家 Robert E. Park 於 1928 年提出，指涉「因參與兩個不同文化團體而產生左右為難或心理衝突狀態的人。他並不完全獻身於其中之一文化的價值和標準，也不對其中任一個他所認同的團體完全接受」的人物或是狀態。葉正，〈社會學詞彙〉（新北：風雲論壇，2009），頁 227；Park, Robert E., "Human Migration and the Marginal Man",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33, no. 6 (1928), pp. 892-893.

<sup>37</sup> Stonequist, Everett V., "The Problem of the Marginal Ma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vol. 41, no. 1(1935), p. 7.

<sup>38</sup> 王惠珍研究戰爭後期總督府檢閱禁刊《蓮霧的庭院》小說集以及作者如何改寫「自我審查」的過程，其中發現收錄其中的〈蓮霧〉校樣版與初出版內容一致，並未更改。從這裡可以推測，〈蓮霧〉通過檢閱，是一種書寫策略的奏效。王惠珍，〈殖民地文學的傷痕——論龍瑛宗《蓮霧的庭院》的禁刊問題〉，《臺灣文學研究集刊》第 9 期（2011 年 2 月），頁 58。

### 三、蓮霧／蘋果之辯證：裂解又重合的主體

〈蓮霧〉之中可以見到許多符號，例如蓮霧、荒城之月、黝黑皮膚、內臟、蘋果、南島、海洋等；角色間對這些符號各自有不同的詮釋，除了相當程度地表述了內、台的刻板印象，灣生與在台日人的微妙差異就在這些不同符號的操作之間再現、產製出來。若把〈蓮霧〉看作是「沒有協商空間的情況下，於文本內部製造協商空間」的嘗試，則需要檢視文本中這些符號的操作，是否含有協商的痕跡：也就是同一符號，卻與當局的霸權意識型態有不同解讀的可能。

在此，筆者想要援引巴特（Roland Barthes）對於解讀符號提出的意義化三層次（three orders of signification）：內涵意義（connotation）、迷思（myth）與意識型態（ideology），作為分析〈蓮霧〉符號的基本框架，作為解構其糾葛成分的途徑。內涵意義即解釋符號意義的第一層：探討製碼者（作者），如何選擇、如何使用一套符號編排文本<sup>39</sup>。重點在於如何呈現符號，或言修辭的選擇。以蓮霧為例，儘管有千百種可能的修辭方式，它常常被選擇描述為負面的、或在強調異國感的脈絡上登場，把隱含其中的某些價值作為明示的事實呈現<sup>40</sup>。接著，第二層的迷思，按巴特的說法是一種神話故事。從內涵意義延伸，探討文本要表達的文化價值，可以說是在社會上占優勢的觀念<sup>41</sup>。諸如南方充滿希望與進取、灣生有朝一日應該要回內地、台灣食物獵奇、不鼓勵內台通婚等，將特定歷史條件、階級、國族裡面產生的觀念轉變成為普遍常識的部分，便屬此例。最後，則是由諸多迷思分析歸納至意識型態的層次。意識型態一詞固然有眾多定義，在此指的是「引導讀者揣摩社會的主流價值，並據此以霸權所期待的解讀方式解讀文本」<sup>42</sup>中的「主流價值」。例如，帝國主義、純血主義、亞細亞主義、南進論、皇民化運動等，即優勢權力挾帶的特定價值觀。

<sup>39</sup> 本文中提及的「意義化三層次」此一概念為巴特提出，筆者另參考學者翻譯分析的版本。參見林宇玲，〈解讀媒體中的性別意涵〉，收錄於羅曉南、余陽洲編，《批判的媒體識讀》（台北：正中，2015年），頁191。

<sup>40</sup> John Fiske 著，張錦華等譯，《傳播符號學理論》（台北：遠流，1995年），頁118。

<sup>41</sup> 同註39，頁191。

<sup>42</sup> 同註40，頁218。

符號分析的過程看似從二元對立下手，然而本文最終目的並非指認出單一或固定的價值，而是要關注二元對立系統指涉帝國意識型態無效的一面。是故，有部分會是逆向操作：就是因為龍瑛宗沒有完全拋棄抵抗的可能，按照步驟分析，預期途中便會遭遇阻礙或是解讀困難的地方。解讀迷思、意識型態時若有不通順，乃至兩者間的邏輯無法合理解釋之處，或能看到作者藉由「灣生」角色，在戰爭末期的主流論述下進行協商表態的痕跡。

藤崎少年在蓮霧樹下吹奏「荒城之月」的情景的確令人聯想到內地情緒與南國景緻的融合，彷彿意味著內台親善或是象徵在台日人的在地化。然而，若從「蓮霧」這個符號切入，它不僅是南方特有的水果，且不如香蕉或木瓜等，是幾乎不被內地所認識的水果<sup>43</sup>。蓮霧的英語為 wax apple，相對於蘋果為 apple，蓮霧是經過形容詞修飾的 apple，在此可以獲得一個主從關係的提示<sup>44</sup>。在殖民時期的各類文獻中，蓮霧除了伴隨南國意象登場外<sup>45</sup>，日本人的介紹中也散見不熟悉、負面、消極的敘述<sup>46</sup>。從藤崎母遙想內地「蘋果紅」臉頰的敘述，再對比上述蓮霧與蘋果關係來看，可以發現其作為一組文本內部辨別內／台、清／濁、高／低的指標，以此推展至其他各個方面的二元對立構造。

若聚焦藤崎各成員對「我」的態度及故鄉偏向的辯論，而區分對「內地／本島」的親疏遠近，可以粗分成二組：友善且接納台灣生活的組別——父親與藤崎少年（蓮霧）；以及相對採取抗拒乃至有距離的組別——母親為主，另外二名姐妹為輔（蘋果），如下表一所示：

<sup>43</sup> 和泉司，〈錯綜する『内』と『外』——四〇年代台湾文壇における「蓮霧の庭」と龍瑛宗を中心に〉，《三田國文》第44號（2006年12月），頁23。

<sup>44</sup>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什麼水果又叫做蠟蘋果〉，（來源：[https://fae.coa.gov.tw/theme\\_data.php?theme=kids\\_edu\\_graphic&id=26](https://fae.coa.gov.tw/theme_data.php?theme=kids_edu_graphic&id=26)，2021年8月31日）。除了 wax apple 外，尚有 rosen apple（臘蘋果）或 java apple（爪哇蘋果）等稱呼。筆者搜尋可及之處，當時台灣有關農學方面的文獻沒有 wax apple 的介紹，學名方面有 Malaiische Rosenapfel 等記載。諸如東京帝國大學，〈臺灣ニ生育スベキ熱帶林木調査熱帶果樹篇〉，《臺灣ニ生育スベキ熱帶林木調査唐木類ノ1-3 藥木香木類ノ1 嗜好品ノ1 熱帶果樹篇》（東京：東京帝國大學農學部附屬演習林，1925年），頁158；工藤彌九郎，〈臺灣に栽培されてゐる蒲桃（ユーゲニア）類〉，《熱帶園藝》4卷7號（1934年8月），頁343。

<sup>45</sup> 安田黑潮，〈臺灣讚仰〉，《臺灣通信協會雜誌》第59號（1924年8月），頁101-102；西村高兄，〈南信二章〉，《臺灣の山林》第83號（1933年10月），頁36。

<sup>46</sup> 當時散見負面敘述如「據當地迷信，種植蓮霧家運會衰微」、「個人不太喜歡」等語。諸如石蘭局主人，〈臺灣俳材解說夏之部十四〉，《ゆうかり》第3號（1928年3月），頁39；小野寺三男治，〈臺灣植物圖譜（九）〉，《あらたま》12卷9號（1933年9月），頁29。

表一 藤崎家成員間「在台日人」／「灣生」認同示意表

父、兒 （對我）友善親切 蓮霧 黝黑皮膚 南海・相思樹・橄欖 硬朗 食用內臟 來則安之 接受現實（台灣） 向南方看 前進 未來 失去故鄉 積極（動） 「東亞」身體	母（姐、妹） 冷淡隔閡 蘋果 紅潤臉頰 高山・紅葉 疲乏 注重外在 不安與嘆息 抗拒現實 向內地看 緬懷 過去 追憶故鄉 消極（靜） 內地本位
---	---

資料來源：筆者製作。<sup>47</sup>

橫向關係為系譜軸（Paradigm）：可以選擇、替換的符號；縱向關係為毗鄰軸（Syntagm）：從選擇而來的符號排列而成的組合。從蓮霧／蘋果、台／內、次等／本格的對照出發，大致上，上表歸納的符號殊途同歸地投射故鄉的方向。在同一個內地人家庭裡面，有著截然不同的認同視角。藤崎父子這組的重點與其說是親近台灣，不如說是與內地之間的關係幾近斷絕。既然內地是無法企及的夢幻，只有留待追憶或想像的故鄉，那麼以現實的本島為依歸，扎根下去自然是一個合理的情感。精神穩定下來，而有安住的餘裕時，就無所謂曬得黝黑的皮膚或是食用豬肉的內臟了。與在地人區隔的最後一道防線恐怕是：當台灣人不必然是當本島人的邏輯。

另一方面，從歷史的角度觀之，在台灣的土地上，相比多數漢人甚至原住民，日本必定是新來者，本島作為真正意義的故鄉終究有其局限性，加上旁人不斷召

<sup>47</sup> 龍瑛宗，〈蓮霧の庭〉，收錄於下村作次郎編，《日本統治期台灣文學台灣人作家作品集（第3卷）》（東京：綠蔭書房，1999年）。

喚內地才是本格的溯源觀念，對少年而言，故鄉無論如何是不穩定的。不穩定的情況下，對於第三地、新世界的追求，就會是順理成章的替代方案。於是南海、相思樹、橄欖等，對南方的渴望便藉由「我」的幻想，與東亞論述交融在一起，構成往反方向（本應該要往北、往內）追求日本的弔詭。

母女組的重點則大多在母親的言詞上。母親怨嘆台灣的風土讓她不健康、景致令人不耐，不斷論述內地的優點：蘋果、紅潤臉頰、高山、紅葉、冷冽等，皆是內地符號的羅列。她懼怕太久沒有回去接觸土地，導致一種物質上的故鄉消失，然而那也就是肇因於精神上對故鄉的執著所致，可以理解為是內地人的過客心態。與父子組相比，事實上故鄉可以說是穩固的。她已經對本島的生活感到疲乏，遑論會有往更南方的憧憬，是故符號都是以遙想內地／輕視本島的傾向為依歸。

至此，可以發現兩組軸線的性別是壁壘分明的。母女組因為本島人身份而無法接受「我」與姊姊論及婚嫁，或是上述內地景物的讚頌或對本地的負評，以及妹妹對「我」童言童語地表達討厭等，都可看作是對純正血統的防衛反應。近代日本的婚姻法制效法歐洲貴族採取的父系、婚生子、一夫一妻等所謂近代家父長制。即意味在一夫一妻的家庭下，繼承父親血液的實子，方能編入戶籍當中。而由於日本舊法制戶籍優先於國籍，法律上符合前述近代家父長制的條件的孩子，藉由戶籍編入國家體制的同時，在生理上也一併獲得了「純正」的國民身分<sup>48</sup>。到了殖民地台灣，由於內台戶政制度相異：台灣人沒有戶籍，內地戶籍採父系主義，故長期以來內台通婚下內地人妻是無「籍」可入的窘境。即便 1933 年《內臺共婚法》實施，給予台灣人戶籍，但實際運作上仍出現文化上、位階上的摩擦，問題重重<sup>49</sup>。用以建構純正國民的父系血統主義有劃定民族與貶抑女性的雙重權力關係。

藤崎父子作為男性，仍可以將自身想作為內地主體而安居於外地、甚至追求開拓外地的浪漫。然而作為女性的母女組抱有主體喪失的焦慮，難以承受內地性進一步稀薄的危險性。若將藤崎家五名成員視為一個整體、一個人格的不同面向，

<sup>48</sup> 長志珠繪，〈近代日本の人種・人種化論と「国際結婚」言説の変容〉，《人文學報》第 114 號（2019 年 12 月），頁 173-175。

<sup>49</sup> 黃嘉琪，〈日本統治時代における「内台共婚」の構造と展開〉，《比較家族史研究》第 27 號（2013 年 3 月），頁 143。

以功能論的角度而言，這兩組粗略分別代表的是台灣本位與內地本位的人物角色。象徵了在台內地人兩種近乎背反的認同，並成為將其游移、混雜的現象聚合在一個單位的機制。

龍瑛宗身為客家人，同時受到日本殖民統治與漢族霸權的雙重壓迫，而有在此兩者之間進退維谷的苦楚。此般經歷勢必使龍瑛宗的自我認同在一種困頓崎嶇的進程中建構，從而形成內在敏感、外在看似保有彈性的「流動主體」。藤崎家微妙的代間認同流動，投影了龍瑛宗身分的雙重壓迫狀態，國：帝國／殖民地；族：屬於本島卻不屬於福佬，身心在此四者的重合與分離中周旋的疲憊。猶如母親精神上屬於內地、身體不屬於本島；灣生兒子則是精神屬於帝國，身體卻不屬於內地的狀態。此外，作者在此以全知的視角刻劃藤崎家的邊緣性何在，將「缺乏自覺的邊緣」問題化，眼光掃描到未意識到的苦楚：努力適應於帝國／霸權／多數的灣生，或從一開始就缺乏帝國／霸權／多數的資格而不自知。對應到居於漢人群體之內的客家人，乃至居於日本霸權之內的本島人時的多重承認焦慮。誠然，若進一步細加探討家庭成員，如姊姊的角色，本文雖粗略地歸類在母女組，但是諸如「我」生病期間準備稀飯、製作果汁的行為，上述裂解的結構也並不真正能周延涵蓋。這恐怕也反映了客家人龍瑛宗糾結的身分認同乃至曖昧的個性。在〈蓮霧〉中灣生／在台日人藤崎家整體比擬為「一個有機體內含至少二種認同，其交錯、消長，形成多重主體」，與龍瑛宗內心不同聲音的對立、混雜與不確定性有所重合。亦即，可視化一般咸認是統治階級的「邊緣主體」之內在糾葛的同時，也投射、暗喻了龍瑛宗自身「流動主體」的精神困境，以一種極其細緻的形式表達出來。

#### 四、阻斷符號的灣生：攻其帝國論述破綻

接著，對 1、4、7 章皆出現的南方符號與灣生進行分析。藤崎少年到了南方戰地當兵，身材變得健壯、精神變得勇敢之敘述，乃至「我」對於南洋的想像諸如「密林」、「藍海」、「南海」、「異域的橄欖」等南方美好刻板印象的呈現，與時局密切相關。日本帝國的「大東亞共榮圈」論述中，其設定的生存圈，除了傳統

勢力範圍的漢字文化圈外，還包含了東南亞及太平洋群島等，歐洲各國所殖民的區域。日本的南方政策除經濟利益的驅動外，思想層面上也有與南洋的西洋殖民國家抗衡，強調「大東亞共榮圈」的優越性與日本身為「模範民族」對當地人進行指導的一面<sup>50</sup>。為合理化這些作為，該時期也出現南方是日本的血脈來源之一，甚至對南方懷有故鄉情懷等論述<sup>51</sup>。

四〇年代，台灣作為日本國策的南進基地，當局開始訓練台灣青年擔任南方建設要員。在這個背景底下，上述這些筆者統稱為「湛藍南島」的符號，其美好的畫面堪稱日本版東方主義(Orientalism)，乍看之下與戰爭末期日本政府的大東亞論述的意識型態，即他者化的南方憧憬傳統有某種程度的接合<sup>52</sup>。然而，其是否完全符合所謂應時文學，則有待進一步釐清。

如灣生這般在東亞內部／日本外地長大的日本人，一方面象徵「大東亞」體制下「共榮」的範例；一方面若否定其混雜性，則無疑將陷入與東亞論述自相矛盾的危機，所以這樣的人物故事不易遭到當局排斥。與此同時，灣生具有阻斷帝國擴張迷思的效果。作中兒子雖然曾經提及：「會想去內地看看，可是不會想要定居」；「嗯，在這裡（台灣）度過一生也沒關係，不過倒是有想去更南方的感覺」<sup>53</sup>，但是現實上藤崎家正是因為經濟因素而來到台灣／無法回到內地。另一方面，即便藤崎父親的態度開放，乃至兒子與「我」之間看似和樂平等的交流，從「同學們都要升中學校」<sup>54</sup>等對話推測，兒子就讀的學校應是小學校，也就是說，平時主要會見面的同學仍然是內地人而非本島人。所以，即便在台灣居住，也沒有產生如「我」本島人脈絡下的纖細性格，也沒有辦法察覺「我」的苦悶。事實上，除了「我」與父親的老朋友蔡先生這樣零星、單點的交往外，沒有與其

<sup>50</sup> 大久保由理，〈「大東亞共榮圈」研究における「南方・南洋」の可能性：南方国策移民の研究史整理として〉，《日本女子大学紀要人間社会学部》第28號（2017年3月），頁2-4。

<sup>51</sup> 林慧君，〈「南方文化」的理念與實踐——《文藝臺灣》作品研究〉，《台灣文學學報》第19期（2011年12月），頁79-80。

<sup>52</sup> 阮文雅，〈南方憧憬の作品における他者——佐藤春夫「旅びと」と中村地平「蕃界の女」をめぐって〉，《東吳日語教育學報》第32期（2009年1月），頁256-257。

<sup>53</sup> 龍瑛宗，〈蓮霧の庭〉，收錄於下村作次郎編，《日本統治期台湾文学台湾人作家作品集（第3卷）》（東京：綠蔭書房，1999年），頁327-328。

<sup>54</sup> 同註53，頁326。

他本島人互動的描寫。看似與內地人、本島人社會都有所接觸，但是接觸時間是被割裂的，其交往密度也是鬆散的。綜上所述，藤崎少年雖然選擇台灣作為故鄉，但事實上是既無法回到內地，在台灣也是一名難以在真正意義上融入多數（本島人社會）的存在。

Stonequist 指出，邊際人在青年期會因察覺到處在上／下位二團體之間的異狀，而產生認同危機，進而調整自身跟兩個團體之間的關係，如果沒有辦法順應／加入任何一方，則可能會出現孤立、退出、移往第三地等，漂流的反應<sup>55</sup>。藤崎少年的南方從軍，看似經由加入身為上位團體的義務儀式，內地性的稀薄一時之間得到解除，不再是至關重要的事。但是，本文要指出，即便當時皆屬帝國範疇，倘若要尋求的是本格的認可，則應該是要回到母國內地而不是南方。退一步而言，也至少要先在台灣內地人團體當中獲得某種認可。如同前述，他是因為經濟「不得已」而來到台灣；因為法律「不得已」而赴南方服役。內地則並非如作中陳述「沒有想要住在日本的意願」等具有選擇權之下的決定，事實上就是「回不去」的地方。作者安排他到一個非屬兩者（內地／台灣）的第三地（南方），避開青春期的認同危機，於是養成了樂天、不敏感的性格。雖然少年爾後會回到台灣來，某程度仍類似於邊際人理論中，個體無法適應上／下位兩者團體時的向外驅力：前往第三地另尋天地的邏輯。

「湛藍南島」的美麗幻影看似承續了南方憧憬的想像；描寫兒子從軍成長等雄壯可靠的形象，也符合戰間對國民的期待。然而，作中灣生是經濟弱勢的外地日本人，遲遲沒有機會進入內地。作為風土馴化的對象，可以說從一開始就喪失了成為「純正」國民的可能性<sup>56</sup>。吳佩珍指出日本當局在戰爭期推廣的優生學論述，亦即「純血論」與「同化主義」於大東亞共榮圈自相矛盾的窘境<sup>57</sup>。從本文的灣生案例可以看到，就連父母雙雙皆為內地人，理當是「純血」的孩子，終究因其在不同風土長大，加上經濟狀況欠佳等多重因素，幾乎不存在成為一般／純

<sup>55</sup> Stonequist, Everett V., "The Problem of the Marginal Ma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vol. 41, no. 1(1935), pp. 11-12.

<sup>56</sup> 范燕秋，〈熱帶風土馴化、日本帝國醫學與殖民地人種論〉，《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 57 期（2005 年 3 月），頁 125-126。

<sup>57</sup> 吳佩珍，〈血液的「曖昧線」——台灣皇民化文學中「血」的表象與日本近代優生學論述〉，《台灣文學研究學報》第 13 期（2011 年 10 月），頁 235-237。

正日本人的可能，並遊走在國族邊緣，由此可見成為「日本人」的要件是極其嚴苛的。

當日本血統不一定伴隨日本精神的保證時，諸如灣生的位階便不能單純用「內地人」或「在台日人」一以概化之。總結而言，筆者認為龍瑛宗在這裡使用「灣生」這個角色赴南方，帶有消解（canceling）或言阻斷「湛藍南島」符號的擴張迷思、皇民迷思及其延伸的軍國主義意識型態的機制存在。因為「南方」根本不可能是彰顯共榮的救贖地，藤崎少年就算成為「勇敢的士兵」也終究不會是純正國民／皇民，而是帝國的邊際人。反倒是藉由灣生往邊陲方向流動又重回故地，指出日本對自己人也用村落社會的邏輯暗地排除異己、不予承認的現象<sup>58</sup>，諷刺地戳破物化太平洋與東南亞的異國情調，乃至多民族共生等大同世界的美好假象。

龍瑛宗在同時期的文學批評上展現的「異見」，是值得留意的。諸如曾經批評島田謹二的外地文學論，乃至在〈南方的作家們〉（南方の作家たち，1942）一文中先讚賞濱田隼雄《南方移民村》（1942），後強調文學應重視美感等，與統治階級的論述及時局所要求的方向，不盡相同<sup>59</sup>。《龍瑛宗傳》提及他的文學作品以及這種不容見於主流視野的文藝主張，曾被內地人評論家群起攻之，並評為壞主張，對此作者評論道「龍氏不管在創作上或是文評上皆不受時局或殖民政策左右，應該也是令人頭痛的人物」<sup>60</sup>。龍瑛宗的評論儘管伴隨應時的字句，但是核心主張仍然顯而易見。前述大東亞文學者大會前後，龍瑛宗的不語、寡言，或者照本宣科，也可以看做是雙重邊緣下練就的迂迴表現。循此脈絡，擱置抵抗抑或是屈從的論斷，至少可以說龍瑛宗沒有迴避表達「不同意見」。而這個「不同意見」的表達形式，到了小說〈蓮霧〉裡，便更為隱匿而纏繞了。

<sup>58</sup> 有關村落社會的概念，可參照蔡亦竹，《圖解日本人論：日本文化的村落性格解析》（新北：遠足文化，2018年），頁163-172。

<sup>59</sup> 龍瑛宗，〈南方の作家たち〉，原載於《文藝臺灣》3卷6號（1942年3月）。本文徵引自龍瑛宗著，陳萬益編，《龍瑛宗全集〔日本語版〕第四冊 評論集》（台南：國立台灣文學館，2008年），頁99-100。

<sup>60</sup> 周芬伶著，劉文甫修訂，劉知甫口述，《龍瑛宗傳》（新北：印刻，2015年），頁153-155。

## 五、結語

戰時殖民地作家的創作，在高壓的環境下，談何容易。單就其抵抗或屈從的成分多寡進行討論，並不一定能完全涵蓋如〈蓮霧〉這般文本的面貌。同樣，談論民族問題的時候，如同龍瑛宗具有流動性的客家身分，與之相對應，作品之中的灣生、在台日人，亦為難以輕易化約等同於內地人的邊緣主體。龍瑛宗在〈蓮霧〉裡面，以既不違反主流論述，同時又暗藏帝國內部矛盾性的灣生，嘗試表達「不同意見」的安排，可以說是在極為有限的空間裡，竭盡其力的書寫策略。至此，書寫灣生有著越過層層關卡（如殖民地、客家人、內向個性、檢閱、戰爭等）後，吐露最後一絲僅存的自我之積極意義。有沒有抵抗、是不是自卑等問題固然值得再深究，但是如本文聚焦於邊緣、流動主體的思路，也未嘗不是考量到時局狀況的一種讀法。

本文以符號學式的方法閱讀〈蓮霧〉，從蘋果／蓮霧的關係為發想，觀察到在台日人家族內部成員認同的複雜程度。若將家庭視為一個完整的系統，這個結構本身就呈現了一種多元而曖昧的表象：呈現各自互異的功能。以母親為主的在台日人為精神上屬於內地、身體不屬於本島的狀態。而以兒子為例的灣生更可細緻地指認為不同於一般在台日人的象徵：精神屬於帝國，身體卻不屬於內地的尷尬處境。其微妙的代間認同流動，投影了龍瑛宗身分的邊際狀態，國：帝國／殖民地；族：屬於本島卻不屬於福佬，並在此四者的重合與分離中周旋的疲憊。若進一步細加探討家庭成員，尤其是姐妹的部分，上述裂解而二元對立的結構也並不真正能周延涵蓋。這恐怕也是充滿協商、混雜的特殊安排，反映了龍瑛宗糾結的身分認同乃至其難以言明的流動性。

接著，聚焦在藤崎少年的南行，發現分析符號途中出現阻礙，隱含義、迷思、意識型態等意義化三層次中，迷思層無法順利推展到意識型態層的情形。無法合理解開其中「暗藏」而「應該出現」的論述，可以說文本並不全然順從於霸權欲導引的優勢解讀，亦即沒有完全服膺國策的意識型態。灣生作為國族邊緣主體之空虛性掩蓋在表面的南方景緻與樂觀的性格裡，並且由此浮現出日本戰間期論述的內在矛盾：不論是純血主義或是大東亞的多元口號，儼然都沒有灣生的位置。

儘管其形式極其幽微，灣生作為戰間期東亞論述的一體兩面，龍瑛宗巧妙地利用了這個特質，投射出了殖民地少數族群作家不可言明的「不同」。

以往對於〈蓮霧〉的研究，由於著重在戰時體制的時代背景，即便注意到灣生角色的異質性，皆傾向從民族融合的理念或是隱然批判殖民當局的角度進行討論。本文認為，〈蓮霧〉同時包含了民族融合與隔閡；順應與批判殖民政策，無法完全將〈蓮霧〉定義為其中任何一端，文本內部具有矛盾與折衝的特性。而讓這個特性得以發揮的機制就是與龍瑛宗同樣擁有邊緣、漂泊、難以言明性質的灣生。藉由特殊的灣生家族與「我」的互動，使〈蓮霧〉在受壓縮的言論空間中呈現難言之隱的可能。

## 參考書目

### 一、專書

- 下村作次郎編，《日本統治期台灣文學台灣人作家作品集（第3卷）》（東京：綠蔭書房，1999年）。
- 朱惠足，《帝國下的權力與親密》（台北：麥田，2017年）。
- 周芬伶著，劉文甫修訂，劉知甫口述，《龍瑛宗傳》（新北：印刻，2015年）。
- 東京帝國大學，《臺灣ニ生育スベキ熱帶林木調査唐木類ノ1-3 藥木香木類ノ1 嗜好品ノ1 熱帶果樹篇》（東京：東京帝國大學農學部附屬演習林，1925年）。
- 林瑞明，《台灣文學的歷史考察》（台北：允晨文化，1996年）。
- 津田勤子，《菁英、文藝與戰爭：由舊制台北高等學校傳閱雜誌《雲葉》與《杏》看菁英學生的精神樣貌》（台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出版社，2018年）。
- 高宗熹，《客家人：東方的猶太人》（台北：武陵出版，1992年）。
- 張維安，《思索臺灣客家研究》（台北：遠流，2015年）。
- 陳芳明，《台灣新文學史》（新北：聯經，2011年）。
- 陳建忠，《日據時期台灣作家論：現代性本土性殖民性》（台北：五南，2004年）。
- 彭懷恩，《大眾傳播理論與模式》（新北：風雲論壇，2016年）。
- 游珮芸，《日治時期台灣的兒童文化》（台北：玉山社，2007年）。
- 葉正，《社會學詞彙》（新北：風雲論壇，2009年）。
- 葉石濤，《台灣文學史綱》（高雄：春暉，2010年）。
- 臺灣總督府，《國勢調查結果表全島編》（臺北：臺灣總督府，1934年）。
- 臺灣總督府，《臺灣人口動態統計》（臺北：臺灣總督官方調查課，1938年）。
- 臺灣總督府，《臺灣人口動態統計》（臺北：臺灣總督府總務局，1942年）。
- 蔡亦竹，《圖解日本人論：日本文化的村落性格解析》（新北：遠足文化，2018年）。
- 龍瑛宗，《杜甫在長安》（台北：聯經，1987年）。
- 龍瑛宗著，張恆豪編，《龍瑛宗集》（台北：前衛，1994年）。

龍瑛宗著，陳萬益編，《龍瑛宗全集〔中文卷〕第七冊 隨筆集(2)》(台南：國家台灣文學館籌備處，2006年)。

龍瑛宗著，陳萬益編，《龍瑛宗全集〔日本語版〕第四冊 評論集》(台南：國立台灣文學館，2008年)。

羅曉南、余陽洲編，《批判的媒體識讀》(台北：正中，2015年)。

John Fiske 著，張錦華等譯，《傳播符號學理論》(台北：遠流，1995年)。

## 二、論文

### (一) 期刊論文

大久保由理，〈「大東亜共栄圏」研究における「南方・南洋」の可能性：南方国策移民の研究史整理として〉，《日本女子大学紀要人間社会学部》第28號(2017年3月)，頁2-4。

小野寺三男治，〈臺灣植物圖譜(九)〉，《あらたま》12卷9號(1933年9月)，頁28-30。

工藤彌九郎，〈臺灣に栽培されてゐる蒲桃(ユウグニア)類〉，《熱帯園藝》4卷7號(1934年8月)，頁342-344。

王莉雅，〈〈植有木瓜樹的小鎮〉〈蓮霧的庭院〉的「越界」書寫〉，《中正臺灣文學與文化研究集刊》第17輯(2016年6月)，頁59-81。

王惠珍，〈第一回大東亞文學者大會的虛與實：以龍瑛宗的文藝活動為例〉，《台灣學誌》創刊號(2010年4月)，頁33-60。

王惠珍，〈殖民地文學的傷痕——論龍瑛宗《蓮霧的庭院》的禁刊問題〉，《臺灣文學研究彙刊》第9期(2011年2月)，頁53-90。

吳佩珍，〈血液的「曖昧線」——台灣皇民化文學中「血」的表象與日本近代優生學論述〉，《台灣文學研究學報》第13期(2011年10月)，頁217-241。

巫毓苓、鄧惠文，〈熱、神經衰弱與在台日人——殖民晚期台灣的精神醫學論述〉，《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54期(2004年6月)，頁61-103。

- 阮文雅，〈南方憧憬の作品における他者——佐藤春夫「旅びと」と中村地平「蕃界の女」をめぐる〉，《東吳日語教育學報》第 32 期（2009 年 1 月），頁 251-279。
- 和泉司，〈錯綜する『内』と『外』——四〇年代台湾文壇における「蓮霧の庭」と龍瑛宗を中心に〉，《三田國文》第 44 號（2006 年 12 月），頁 1-28。
- 林慧君，〈「南方文化」的理念與實踐——《文藝臺灣》作品研究〉，《台灣文學學報》第 19 期（2011 年 12 月），頁 75-98。
- 林慧君，〈日據時期在台日人小說中灣生的認同歷程〉，《國文天地》25 卷 3 期（2009 年 8 月），頁 56-61。
- 邱雅芳，〈客家作家在台灣文學史的位置：以葉石濤、彭瑞金與陳芳明的台灣文學史書寫為探討對象〉，《全球客家研究》第 9 期（2017 年 11 月），頁 249-277。
- 長志珠絵，〈近代日本の人種・人種化論と「国際結婚」言説の変容〉，《人文學報》第 114 號（2019 年 12 月），頁 173-175。
- 范燕秋，〈熱帶風土馴化、日本帝國醫學與殖民地人種論〉，《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 57 期（2005 年 3 月），頁 87-138。
- 許維育，〈理想的建構——談龍瑛宗〈蓮霧的庭院〉與呂赫若〈玉蘭花〉〉，《水筆仔》創刊號（1996 年 12 月），頁 2-13。
- 黃嘉琪，〈日本統治時代における「内台共婚」の構造と展開〉，《比較家族史研究》第 27 號（2013 年 3 月），頁 128-155。
- 劉紀蕙，〈從「不同」到「同一」：台灣皇民主體之「心」的改造〉，《台灣文學學報》第 5 期（2004 年 6 月），頁 49-83。
- 蔣淑貞，〈反抗與忍從：鍾理和與龍瑛宗的「客家情結」之比較〉，《客家研究》1 卷 2 期（2006 年 12 月），頁 1-41。
- Stonequist, Everett V., "The Problem of the Marginal Ma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vol. 41, no. 1(1935), pp. 1-12.
- Park, Robert E., "Human Migration and the Marginal Man",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33, no. 6 (1928), pp. 881-893.

## （二）學位論文

鳳氣至純平，〈日治時期在台日人的台灣歷史像〉（台南：國立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14年）。

## 三、雜誌文章

石蘭局主人，〈臺灣俳材解說夏之部十四〉，《ゆうかり》第3號（1928年3月），頁39-41。

安田黑潮，〈臺灣讚仰〉，《臺灣遞信協會雜誌》第59號（1924年8月），頁101-102。

朱玉芳，〈超越時代的民族情感〉，《聯合文學》第182期（1999年12月），頁109-113。

西村高兄，〈南信二章〉，《臺灣の山林》第83號（1933年10月），頁24-28。

萬波おしえ、遠藤太郎，〈文化放談 故郷と第二世の問題〉，《文藝臺灣》2卷1號（1940年3月），頁103-105。

龍瑛宗，〈憶起蒼茫往事——「午前的懸崖」二三事〉，《文訊》第30期（1987年6月），頁58-60。

## 四、報紙文章

新垣宏一，〈第二世の文學（上）〉，《臺灣日日新報》，1941年6月17日，第4版。

新垣宏一，〈第二世の文學（下）〉，《臺灣日日新報》，1941年6月19日，第4版。

## 五、電子媒體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什麼水果又叫做蠟蘋果〉，（來源：[https://fae.coa.gov.tw/theme\\_data.php?theme=kids\\_edu\\_graphic&id=26](https://fae.coa.gov.tw/theme_data.php?theme=kids_edu_graphic&id=26)，2021年8月31日）。

## 六、未出版檔案

陳芳明，「陳芳明手稿〈南國崩壞〉」（1994年3月10日），國立政治大學圖書館藏，檔案典藏號：ccl\_fmc\_ma\_00457。